

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对东南亚日侨的调查 ——以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为中心*

陈艳云

(中山大学 亚太研究院东南亚研究所,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 要:从 1918 年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设立至上世纪 30 年代中期,为配合日本政府推行对东南亚的“经济南进”政策,扶持东南亚日侨企业,帮助日本经济势力向东南亚渗透,台湾总督府以总督官房调查课为中心,对东南亚日侨展开了全面调查活动。本文通过对日本和中国台湾所藏总督府相关调查报告的分析研究,考察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对东南亚日侨的调查活动,揭示总督府对日侨调查活动的动因、调查方式、调查内容及该项调查在日本“南进”东南亚进程中的作用。

关键词:台湾总督府;调查;东南亚日侨;南进

中图分类号:D73/77.313.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56(2009)04-0058-10

前 言

关于东南亚日侨及日侨社会的研究是日本学者关注的重要领域并已取得重要成就。相关论著主要有原不二夫的《英属马来亚的日本人》^[1],该著作系统研究了战前英属马来亚与北婆罗洲的日侨社会,作者将日本移民进入马来亚分为 3 个时期,即劳动移民期、小农移民期及资本移民期、移民社会“官民接近”期,并详细分析了各时期日本南洋移民的方式、移民社会的特点。另外,上世纪 80 年代,日本学者根据日本外务省《外务省海外日侨职业人口调查》档案资料,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东南亚日侨的职业和人口状况进行了专项研究,并出版论文专辑《战前进出东南亚的日本人》,该专辑收录了桥谷弘等 5 位学者的文章,这些文章对东南亚地区日侨的人

* 收稿日期:2009-09-11

作者简介:陈艳云,女,湖北武汉人,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东南亚研究所副教授,博士。

《战前进出东南亚的日本人》,《亚洲经济》(特辑),1985 年第 3 号,第 26 卷。该专辑收入的论文有:桥谷弘:《战前居留东南亚的日本人人口动向——与其他地区比较》;清水元:《外务省 居留海外的日本人各行业人口调查 一件 的资料性质》;清水元:《战前新加坡、马来亚的日本人经济参与形态——以各行业人口调查为中心》;桥谷弘:《战前菲律宾的日本人经济参与形态——以各行业人口调查为中心》;村山良忠:《战前荷属印度的日本人经济参与形态——以各行业人口调查为中心》。

口、职业及经济状况等进行了研究,他们得出共同的结论是,在两次大战之间,东南亚的日侨与美洲、“满洲”的日侨不同,他们是“非政策性移民”,属“景气反应型”移民,即东南亚日侨状况随着东南亚经济兴衰而变化。矢野畅在其《日本人的南洋史观》中提出,上世纪3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向东南亚地区的移民主要是“无告之民”,即谋求向南方发展的民间移民,是日本国民自发向南移民的“南方参与”时期,直到3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移民才成为日本“南进”政策的一部分。^[2]

然而,笔者在对台湾总督府对东南亚日侨的调查和扶持课题研究中发现,上世纪30年代中期以前,尽管东南亚日侨以“非政策性移民”为主体,但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无告之民”,由于日本政府和台湾总督府推行的一系列对东南亚日侨的政策、措施,这些“无告之民”已被被动地成为日本推行“南进”政策的工具。因此,对台湾总督府对东南亚日侨的调查和扶持展开研究,对于我们准确把握日本对东南亚的“南进”政策及东南亚日侨在“南进”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还十分薄弱。本文拟通过对日本和中国台湾所藏总督府相关调查报告的分析研究,考察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对东南亚日侨的调查活动,揭示总督府对日侨调查活动的动因、调查方式、调查内容及该项调查在日本“南进”东南亚进程中的作用(关于台湾总督府对东南亚日侨的扶持,笔者将另文加以论述)。

从1918年6月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设立,至1935年7月日本中央政府改组总督府机构,新设台湾总督官房外事课,是日本对东南亚推行“经济南进”政策时期,也是总督官房调查课对东南亚日侨进行调查的重要时期。日本政府和台湾总督府十分关注东南亚日侨问题,把向东南亚移民看作是缓解日本国内人口过剩压力及粮食资源短缺危机的手段,同时企图通过向东南亚移民来扩展日本的势力范围。为了能有效地对东南亚日侨进行扶持,首先必须对东南亚日侨的状况有全面的了解。总督府对东南亚日侨的调查是日本向东南亚进行经济渗透的需要,也是向东南亚进行军事侵略的必要准备。

一、“南洋移民推进论”与日本“南进”

日本人向东南亚地区移民虽然从16世纪中叶已经开始,并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数不清的日本人町,但由于日本国内锁国令的颁布与实施,这些日本人町犹如昙花一现,很快被当地社会所融合。至明治维新前,日本政府取消锁国政策,才开始有少量的日本人移居东南亚。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了狂热追求国家现代化的道路。日本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使农村日趋凋敝。由于明治政府向农民每年征收高额土地税,加速了农民失去土地的速度,到1884年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就达30万人,加上日本人口出生率的不断上升,致使大量农村人口流向城市。这一时期日本城市的失业率和家庭成员自杀率也直线上升。面对这种严酷的社会现实,许多人不得不去海外寻求发展机会。与此同时,由于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东南亚实行殖民地“开发”政策,导致东南亚的种植园、矿山劳动力严重缺乏,工资相对日本国内高出许多,因此对日本人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由于日本国内市场狭小,城市工业发展与农业落后形成的尖锐矛盾,1890年爆发了日本历史上第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这种背景下,部分日本思想家率先提出“南洋移民推进论”,主张以和平方式向东南亚移民,以解决日本国内人口过剩问题。日本早期“南进”论者志贺重昂、田口卯吉等,都是“南洋移民推进论”的积极倡导者。

“南洋移民推进论”者最早的组织是1893年3月成立的殖民协会,日本外相榎本武扬为会长。

笔者认为,自明治维新到太平洋战争结束,日本“南进”先后经历了“观念南进期”、“经济南进期”和“国策南进期”。详细内容请参见拙作:《日本“南进”与台湾总督府关系研究述评》,《亚太评论》2007年第1-2合期。

该协会认为:移民事业是日本“当务之急”,是“国家大计”。^{[3][4]}主张鼓励日本人向南洋移民,“尤其应当向马来半岛移民”。^[5]殖民协会创立时的436名会员中,有3人专门负责向马来亚移民。早在1892年5月,日本驻新加坡二等领事齐藤干致信榎本武扬称:“倘若将我帝国人民移居到‘克拉’地峡附近地区而后控制这大片荒芜地带,乘机在克拉地峡左右合适位置开凿一条运河,我帝国即控制了整个马来半岛,东西两洋的商权也尽在我帝国掌握之中……向马来半岛移民事业关乎我国将来的前途,因此不可等闲视之”。^[6]该信受到榎本武扬的高度重视,1893年10月到1894年2月,他亲自视察英属马来亚西海岸,并将该地区选为“殖民地样板”。1896年,在殖民协会的帮助下,爱知县地主石原哲之介率其乡里及邻近乡贫农、小农共27人移民到柔佛州,这批人是马来半岛最早的日本农业移民,石原将这些移民称为“创业移民”。^[7]

一战期间,趁欧洲列强忙于欧洲战争而无暇东顾之际,日本经济势力大举南进东南亚,大批日侨涌入东南亚各地。日本“南进”论者纷纷著书立说,介绍南洋产业和贸易情况,发行供移民参考的指南书,大张旗鼓地宣扬向南洋移民的必要性。然而好景不长,由战争带来的“景气”很快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消失。日本国内接踵而至的是经济危机、关东大地震的冲击,农民贫困、工人失业,人口过剩矛盾日益尖锐,劳工运动更是风起云涌。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政府企图通过向海外移民缓解国内社会矛盾。日本思想家也纷纷建言献策,为日本对外殖民扩张制造理论根据。山内正睦在其《殖民论》中详细分析了日本政府通过向外移民扩张可获得的经济、财政、政治、社会“利益”及无形的“利益”:即享有殖民地的母国的光荣。^[8]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也成为日本扩张主义的根据。《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作者福素之公然宣称,移民是解决日本人口问题的重要手段。日本思想家的上述言论对日本政府推行向外移民扩张政策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由于大洋洲、美洲相继采取了限制日本移民政策,如大洋洲1898年颁布《珍珠贝海参渔业法修正案》,禁止日本人经营采贝业,1901年又制定了移民限制法,日本对大洋洲的移民因此受到限制。1907年日美签订君子协定,美国也开始限制日本对美国的移民,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排日移民法,完全关闭日本对美国移民的大门。由于中国一战后反日情绪高涨,日本对中国大陆的移民计划也受挫。针对这种形势,福素之提出,日本应当向待开发的地区移民。^[9]在日本政府看来,东南亚地区就是拥有大量未开发处女地、适合日本移民的地区。日本拓务省拓务局局长高山三平指出:“南洋距离我国较近,历史上有紧密联系,目前尚有大片土地未得到开发,作为日本人的移住地,不仅是开拓事业的理想场所,将来我国产业的确立及确保国防安全都是必不可少的地方。向南洋发展经济势力,是我国的重要国策”。^[10]南洋厅长官林寿夫也宣称:南洋是日本的生命线,“若向南洋移民,这些移民在南洋立稳脚跟的话,西太平洋就会真正成为我国的领海”。^[11]由此不难看出,日本政府主张向南洋移民,除了为缓和国内矛盾,缓解人口过剩压力之外,更深层的动机是企图通过移民来扩展日本的势力范围。

尽管如此,由于上世纪3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政府推行的国策是以“满蒙”地区为重点的“北进”政策,而东南亚地区是欧美国家的势力范围,为了维持与欧美列强的关系,避免发生摩擦,日本政府不便亲自出马有组织地向东南亚移民,而是利用台湾与东南亚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把台湾作为日本向东南亚移民的据点,由台湾总督府代替日本政府出面扶持东南亚日侨企业,推进对东南亚的移民工作,如此,既可达成日本政府企图通过向东南亚移民扩展日本经济势力的目的,又可避免与东南亚宗主国产生摩擦,不啻为一种最佳选择。

由于台湾与东南亚地缘上的特殊关系,加上一战后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已趋向稳定,为配合日本政府对东南亚推行的“经济南进”政策,台湾总督府充当了“南洋移民推进论”的积极鼓吹者和实施者。总督府甚至主张把对东南亚的移民问题纳入国策。1929年,总督官房调查课的一篇题为《作为国策之南洋移民问题》的调查报告,呼吁“将对南洋的移民工作纳入基本国策,这已是当务之急”。“作为国家百年大计,应在奖励南美移民的同时,向位于太平洋中央的南洋输送资本和移民,

鼓励彼此间的贸易,逐渐巩固日本移民的地盘。^[12]台湾总督府之所以重视东南亚日侨问题,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认识:首先,总督府认为向东南亚移民可以缓解日本所面临的人口过剩及粮食资源短缺危机。总督府认为,“南洋地处热带,其单位面积生产力是日本的数倍,我国国势若能扩张到南洋,则有望解决我国人口及粮食问题,确立产业立国的基础”。^[13]其次,总督府认为移民是实现“日本国土延伸”的手段。日本外事协会在其《从当地角度考察南方政策》一书中指出,某位德国史学家曾说:“以武力夺得的土地,还会被武力剥夺,以锄锹获得的土地才能够长久拥有”。总督府将此话奉为真理,并依教奉行。^[14]以后台湾总督府机关刊物《台湾时报》又发表文章,引入地缘政治理论,论证日本对南洋移民的必要性,提出“势力圈是由无数条势力线构成,而势力线的延伸则要依靠移民来实现”。^[15]可见,总督府认为通过移民在当地拥有土地是扩展日本势力的一种有效手段。再次,总督府认为,在军事上,东南亚地区“因为与我国一起横亘于太平洋中央,处战略要地,是解决太平洋问题的关键地区”。^[16]而日侨是帝国的臣民,肩负“向海外弘扬帝国国威”的历史使命。^[17]因此,总督府将扶持南洋日侨企业作为日本“南方经略的重要一环”。^[18]最后,总督府认为,可以将台湾作为日本向东南亚移民的“据点”。^[19]因为,台湾比邻东南亚,与东南亚气候条件相似,日本人移居东南亚之前,先在台湾接受训练,能较快适应亚热带、热带条件”。

在上述思想观念的指导下,总督府有目的地对东南亚日侨企业进行扶持。总督府的华南与南洋设施费,其大部分即用于对日侨企业的扶持。在对南洋的设施补助费中,对南洋日侨企业的补助就占到60%以上。^[20]为了更有效地扶持东南亚日侨经济势力,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积极展开对东南亚日侨的调查活动。

二、调查员及调查方式

总督官房调查课对东南亚的各项调查报告,以翻译、介绍西方或当地殖民者的相关资料为主,唯独对东南亚日侨调查例外。调查课对日侨调查的调查员构成及调查方式如下:

(1)由总督府派遣调查员或总督府技师对东南亚日本人种植园等进行实地问卷调查。例如,调查课曾派遣毕业于台北高等商业学校的年轻调查员盐谷岩三于1930-1931年间赴印尼巴达维亚法科大学留学,并让他负责“对日侨种植园的利息补助制度”课题的调查研究。《南洋日本人之事业》(1926年)^[21]及《沙捞越王国日本人企业一览》(1928年)^[22]等调查报告则是总督府派遣技师和调查员到东南亚进行实地调查的结果。《南洋各地日本人种植企业要览》(1929年)^[23]及《南洋各地日本人种植企业要览 附 南洋日本人林 矿 水产业要览》(1935年)^[24]等,均是根据总督府在东南亚日本人种植园进行的问卷调查做成的报告。

(2)总督府委托东南亚日本种植园经营者或商人进行调查。上世纪30年代以前,总督府对东南亚日侨调查的重点是对日侨经济状况的调查,日侨种植园经营者为主要调查员。如,《英属北婆罗洲、斗湖地区的椰子种植业》^[25]的调查员鹤仲寿美,长年在英属婆罗洲从事各种热带植物的试验,该报告即是他在实验基础上进行研究而写成的。该报告同时还汇集了英属婆罗洲经营种植园的其他日本移民的资料。又如,《荷属东印度莫罗卡斯群岛近海鲷渔业及同地方冲绳县渔民之状况》^[26]的作者是江川俊治,他受总督府之托,负责调查日侨渔业状况。他本人也在荷属东印度经营种植园。再如《马来半岛与苏门答腊种植企业之比较》^[27]的调查者增渊佐平在南洋经营橡胶种植业达十二载,并且与南洋协会关系密切。

(3)由总督府提供调查经费,华南银行派调查员赴东南亚地区进行调查。上世纪30年代前半期,华南银行充当了对东南亚日侨调查的主要角色。总督官房调查课和总督官房外事课对东南亚日侨调查报告共有36种,其中,华南银行的调查报告就有9种(见附录),并且全部集中在上世纪30

年代初的4年间。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华南银行是日本向东南亚进行经济扩张的主要金融机构之一,负责日本对东南亚、华南等地贸易活动的贷款、汇兑业务,并且与台湾总督府有着特殊关系,是“台湾总督府金融政策的代行机构”。^[28]

第二,在东南亚的日本银行中,正金银行在东南亚的分支机构仅经营汇兑业务,台湾银行在经历了1927年的金融危机的冲击后,其在东南亚的分支机构的营业范围也仅限于汇兑及短期资金贷款业务。在此情形下,台湾总督府认为,在同行屡遭挫折的情况下,华南银行尽管也处境困难,但在东南亚各地的分支机构仍照常营业,在东南亚的日本银行中,华南银行对日侨状况相对较为熟悉,因此,只有华南银行可作为向东南亚日侨提供低息长期贷款的唯一金融机构。^[29]

第三,总督府认为,东南亚日侨企业的发展面临的障碍是资金缺乏,同时又没有相应的融资机构。1920年经济危机后,东南亚的日侨企业陷入困境,有些濒临破产。尽管总督府对东南亚日侨企业给予一定的补助,但这些补助对于日侨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30]因此,东南亚的日侨企业急需的不是微薄的补助金,而是能为其提供金融服务。^[31]由华南银行对日侨经济、金融状况展开调查,目的在于研究如何向日侨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三、调查报告综述

总督官房调查课和官房外事课对东南亚日侨的调查报告共有36种(见附录),报告内容以经济调查为主。其中,综合性经济调查报告有16种,对日侨种植业调查报告占三分之一,多达12种。在综合性经济调查报告中,对种植业调查也占有相当大比重。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第一,种植业是东南亚日侨的主导产业,占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在种植业中,又以橡胶种植业为主。橡胶是东南亚重要的资源,也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占世界市场90%的东南亚橡胶业,自然引起日本的关注。东南亚日侨橡胶种植业主要分布在英属马来亚、荷属苏门答腊、英属北婆罗洲、荷属婆罗洲、爪哇等地。其中以英属马来亚、荷属苏门答腊分布面积最大。其次是菲律宾的马尼拉麻及东南亚各地零散分布的可可、椰子种植业等。第二,1929年至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对东南亚日侨种植业的冲击最大,不少被迫卖掉种植园,有的移居他方经营新的种植园,因而,这段时期是东南亚日侨种植业急剧变动时期,因此,总督府对种植业的调查内容也在不断更新。从附录中可以看出,日侨种植企业要览及种植企业地图不断被增补与修订,从1926年到1935年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修订增补了4次,其中,1929年3月到1930年10月的短短1年半的时间里,就发行了两版。由此可见总督府对种植业变化情况的重视程度。

其次是对东南亚日侨渔业状况的调查。渔业调查报告共有4种。总督府认为,东南亚渔业几乎由日侨独占。因为,“东南亚水产资源丰富,当地住民渔业技术极其落后,欧美人又对渔业缺乏兴趣。日本是岛国,在渔业方面技术先进,经验丰富,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渔业是东南亚日侨最有希望发展的一个行业”。^[32]新加坡、马来半岛附近海域是东南亚日侨渔业中心。新加坡日侨渔业人口从1925年起迅速增长,1929年增加到825人,超过当地日侨商业人口,在新加坡日侨社会中上升为第一位。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新加坡日侨渔业人口一直居于首位。^[33]爪哇的巴达维亚为日侨渔业的另一个中心。英属北婆罗洲或菲律宾马尼拉近海等地均是日侨渔业发展的区域。^[34]因此,总督府对水产业和渔业的调查以上述地区为主。相关调查报告主要有:《菲律宾、婆罗洲及苏拉威西近海渔业试验报告》(1928年)、《新加坡渔业状况》(1929年)、《新加坡日侨水产业》(1932年)等。

在总督府调查报告中,对东南亚日侨金融业的专门性调查报告有1种。此外,华南银行9种调

查报告中均有专门章节论及移民状况及金融政策等问题。

为帮助东南亚日侨发展相关产业,为日本经济势力向东南亚扩张提供参考资料,总督府还对东南亚各地区产业资源展开调查。如调查报告《南洋各国种植园 橡胶及土人橡胶》(1931年),用总督府调查课的话说,是东南亚日本橡胶种植园业主和金融业者的重要“参考资料”。^[35]《南洋各地物产 交通 人口地图》^[36]、《南洋的养蚕业 附:菲律宾达沃州养蚕业调查报告》^[37]等则被看作是东南亚日侨产业发展的指南书。

从调查地区看,重点调查的地区有两类,一类是所谓地广人稀,西方殖民主义者尚未充分开发的地区,包括:英、荷属婆罗洲(4种),苏门答腊(1种),荷属苏拉威西(2种),沙捞越(3种),文莱(1种)。另一个重点调查的地区是美国统治下的菲律宾。对菲律宾的调查报告有7种,其中对菲律宾南部达沃地区的调查报告就有4种之多。对于为何选择上述地区作为重点调查的地区,台湾总督府的解释是:“过去我国将英国在军事上过于敏感的海峡殖民地和人口密度大于我国的爪哇作为移民重点地区,其结果只能刺激英荷的神经,最后招致日侨被排斥的后果”。因此,日本向东南亚地区移民时应当“避免向各列强的开拓地,或军事上特别引人关注的地区移民。孙吴的所谓直捣敌人心脏虽是军事要诀,但移民却要与之相反,应当从偏僻边远的地方入手,逐步建立根据地,静观敌人动向,伺机向心脏地区包抄”。^[38]现在东南亚的形势是:“英国占领了新加坡后,海峡殖民地不容他人染指。荷属东印度中,爪哇是其心脏,人口稠密,没有接纳日本人移民之余地。在南洋,我国应该投资及移民的地点是人口稀少的美属菲律宾、尚未得到充分开发的荷属苏门答腊、英属、荷属婆罗洲、荷属苏拉威西等地”,“从军事上说,这些岛屿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39]而这些地区正好是总督府重点调查的区域,其中,荷属东印度被总督府认为是最适宜日本移民的地区。究其原因:第一,荷属东印度面积占东南亚的一半左右,除爪哇以外的大部分地区地广人稀;第二,资源丰富,而且许多都是日本短缺的资源;第三,荷兰殖民统治环境与其他地区比较起来相对宽松,“荷属东印度殖民政府对外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40],因此,有利于日本向该地区进行移民和渗透。

总督府还特别强调要以菲律宾的达沃地区作为除台湾之外日本向东南亚移民的第二个根据地,因为达沃地区“位于待开发地区的中心位置,土地肥沃,气候宜人,拥有天然良港。日侨有1万人,占达沃面积的三百分之一,人口的百分之一,全棉南老岛生产额的四分之一。……达沃堪称我国开拓移民的典范,应将其作为向南洋发展的第二根据地”。“我国应当将达沃作为向南洋发展的根据地。逐步向荷属东印度的苏拉威西、苏门答腊、法属印支、泰国、英属马来亚发展”。^[41]因为“到南洋拓殖的新移民可以先派遣到达沃,从事相当时日的劳动,取得热带地区开拓作业的经验后,同时也积累了相当资金,之后,由于南洋的开垦作业一般大同小异,因此,可以直接将他们派送到新拓殖地”。^[42]总督府提出,“以台湾为根据地,以达沃为立足点,开拓其他东南亚诸岛,此乃国家百年大计也”。^[43]

四、有关日侨调查对日本“南进”的影响

台湾总督府开展对东南亚日侨的调查,对日本“南进”政策所产生的影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1) 调查成果成为日本政府制定东南亚移民政策的基本参考资料。

总督府对东南亚日侨的调查报告,有些调查报告被日本中央政府部门直接采纳。如,日本商工省贸易局贸易课的《南洋日本人的橡胶投资事业》(1928年6月)^[44],即参考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调查报告《南洋各地日本人种植企业要览》(1926年)^[45]写成。另外,拓务省《拓务要览》(1931

年)^[46]中的《南洋各地日侨种植业、租借、种植、生产、种植面积及投资额比较表》依据的是1930年10月发行的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调查报告《南洋各地日本人种植企业要览》^[47]的统计资料。台湾总督府调查报告《南洋各地日本人种植企业要览 附:南洋日本人林·矿·水产业要览》(1935年)^[48]被拓务省拓务局采纳,并发行《南洋种植业要览》(1935年)。

(2) 台湾总督府关于东南亚移民的政策建议成为了日本政府对东南亚日侨的主要政策方针。

台湾总督府主张国策移民,对东南亚日侨实行扶持、奖励及保护措施,完善金融体系,重视对南洋日侨的调查,均成为日本政府对东南亚日侨的政策方针。如,1936年日本拓务省拓务局局长高山三平提出日本对南洋移民政策包括以下3个方面:第一,谋求南洋方面以移民及海外拓殖事业为中心的统制经济的发展;第二,海外拓殖事业的发展与本国资源及产业情况相相应;第三,完善对东南亚日侨及日侨经济的调查、指导奖励等各项设施,尤其需要充实和完善南洋日侨的拓殖金融服务。^[49]高山三平尤其强调指出:“对南洋日本人移住地及各种资源的调查,是发展的前提条件”,“对南洋日侨企业采取适当的技术指导、扶持及奖励措施是非常必要的”。^[50]由此可见,日本政府对东南亚日侨政策与总督府调查报告中提出的政策建议是一致的,尤其在第三方面,台湾总督府推行的一系列针对东南亚日侨的措施为日本政府推行移民政策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3) 在东南亚的日侨企业能屡遭经济危机冲击而得以生存并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台湾总督府长期以来对东南亚日侨经济的调查研究与所采取的扶持政策密切相关。这些企业在日本南进东南亚进程中亦发挥了重要作用。海军少将匝瑳胤次认为“南洋日侨事业对日本来说十分重要”。^[51]“南方地区生产日本所必需的原料的大部分。因此,日侨如果生产这些原料,与日本国内生产建立紧密的供需关系,对移民和企业来说可形成密不可分的共生关系,没有比之更安全的了”。^[52]因此,日侨经济的发展能够给日本国内带来诸多好处:首先,由日侨企业提供日本所需战略资源,能降低日本对外部市场的依存度,既安全又可靠;其次,可以促进日本海运业的发展;再次,可以使日本国内获得大量侨汇。

事实也正是如此。东南亚的日侨企业在日本战略资源的调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南洋的铁矿业是日本制铁原料的重要来源地,在英属马来亚的日侨企业石原产业海运合资会社,1921年向日本国内年供应铁矿石仅为10-30万吨。该公司在日本政府和台湾总督府的扶持下,对设备进行更新改造,产量得到大幅度提高,1930-1931年已提高到年供80-90万吨。日本国内八幡制铁所所需矿石60%以上由该公司提供。据日本拓务省统计,该公司在1911年至1929年间总共向日本国内提供了2800万吨矿石。1930年为85万吨,并且都是“优质矿石”。^[53]在种植业方面,1936年,东南亚日侨企业种植业的生产量大约有1.7至1.8万吨。^[54]尽管与日本实际需求还相去甚远,但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日本对外部的依赖程度。1927年至1930年,日本的麻进口量次于美英居第三位。但到1931年,日本的进口量跃居世界第一位。在日本进口的马尼拉麻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来自菲律宾的达沃。而达沃马尼拉麻生产的80%以上是由日侨企业生产。日本进口达沃麻80%由东南亚日商进行交易。达沃港马尼拉麻的运输船中,日本船只就占到45%。菲律宾全岛麻输出量的25%由日商进行交易。因此,“日本人在马尼拉麻的生产、出口、运输、消费等各方面均执其牛耳”。^[55]而这些均与台湾总督府对东南亚日侨麻种植业的扶持密切相关。在太平洋战争期间,铁矿石和麻都是日本不可或缺的重要战略资源。日侨经济的发展也给日本国内带来了巨额侨汇,据统计,仅达沃日侨每年汇往日本的汇款就超过150万日元。^[56]

总之,日本政府及台湾总督府关注在东南亚的日本侨民,重视对日本侨民的调查,实质上是要弄清在东南亚日侨的情况,设法对日侨企业进行扶持,既有利于日本经济势力向东南亚地区进行渗透,又为日本进一步“南进”东南亚作准备,其目的是利用东南亚日侨为日本的“南进”政策服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上世纪3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对东南亚的移民,并不完全是日本学者所说的“无

告之民”,也绝对不是纯粹意义上的“非国策移民”。换言之,日本对东南亚的移民,已不完全是移民个人的自发行为,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日本政府和台湾总督府的支持和鼓励,成为日本政府推行对东南亚经济“南进”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日本政府和台湾总督府的立场看,他们所要解决的人口问题,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向外“移民”,而是企图借助东南亚日侨扩展日本的势力范围,使“日本国土”得到“延伸”。

附录 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外事课南洋日侨调查报告目录

发行年	作者、报告名	发行者
1917	台湾总督府殖产局工商课:《南洋日本人企业》	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
1921	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苏拉威西事情》	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
1921	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椰子的种植及其利用》	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
1926	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菲律宾达沃州日本人之事业》	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
1926	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南洋日本人之事业》	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
1926	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南洋各地种植企业可能性比较一览》	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
1926	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南洋各地日本人种植企业地图》	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
1926	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南洋各地日本人种植企业要览》	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
1927	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英属北婆罗洲、斗湖地区椰子种植业 附:企业参考资料》	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
1927	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英属北婆罗洲、美属菲律宾日本人企业要览》	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
1928	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菲律宾、婆罗洲及苏拉威西近海渔业试验报告》	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
1928	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沙捞越王国日本人企业一览》	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
1928	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沙捞越王国日本人状况》	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
1928	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荷属东印度莫罗卡斯群岛近海鲣渔业及同地方冲绳县渔民之状况》	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
1929	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作为国策之南洋移民问题》	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
1929	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菲律宾达沃州日本人产业调查报告》	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
1929	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南洋的养蚕业 附:菲律宾达沃州养蚕业调查》	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
1929	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新加坡的渔业状况》	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
1929	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南洋各地日本人种植企业地图》(修订版)	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
1929	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南洋各地日本人种植企业要览》	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
1929	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马来半岛与苏门答腊种植企业之比较》	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
1930	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南洋各地日本人种植企业要览》(修订版)	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
1930	华南银行:《英属北婆罗洲事情》	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
1930	华南银行:《英属北婆罗洲日本人种植事业调查》	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
1930	华南银行:《达沃事情》	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
1930	华南银行:《马来半岛日本人经济事情》	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
1931	华南银行:《沙捞越、汶莱、拉布安事情》	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

续附录

发行年	作者、报告名	发行者
1931	台湾银行巴达维亚支店编:《荷属东印度金融状况 附:英属北婆罗洲金融概况》	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
1931	华南银行:《爪哇日本人事业》	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
1932	华南银行:《新加坡日本人水产业》	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
1932	华南银行:《对菲律宾日本人事业之调查》	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
1932	华南银行:《马六甲、莫阿、巴特巴哈、斯雷姆邦、内格里斯米琅各地日本人现状》	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
1935	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南洋各地企业须知》	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
1935	台湾总督官房外事课:《南洋各地日本人种植企业要览 附 南洋日本人林、矿、水产业要览》	台湾总督官房外事课
1935	台湾总督官房外事课:《日本对南洋的经济扩张》	台湾总督官房外事课
1937	台湾总督官房外事课:《南洋各地日本人企业要览》	台湾总督官房外事课

资料来源:《台湾总督府外事部並南方资料馆发行南方关系资料印刷物目录》,载台湾经济年报刊行会编:《台湾经济年报》,东京:国际日本协会,1943年,第21-48页。

亚洲经济研究所编:《旧殖民地关系机关刊物综合目录——台湾编》,东京:亚洲经济研究所,1973年。

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编:《南支那及南洋调查书目录》,台北: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1935年;台湾总督官房外事部编:《南支那及南洋调查书目录》,台北:台湾总督官房外事部,1939年。

台湾总督府相关调查报告。

注释:

- [1] 原不二夫:《英属马来亚的日本人》,东京:亚洲经济研究所,1986年。
- [2] 矢野畅:《日本的南洋史观》,东京:中央公论社,1979年,第163-165页。
- [3] 殖民协会:《殖民协会报告》,第1号,1893年4月,第105-107页。
- [4][5][6][7] 原不二夫:《英属马来亚的日本人初期农业移民》,《亚洲经济》,1985年第7号,第4、4、7、9页。
- [8] 山内正睦:《殖民论》,东京:宝文馆,1911年,第66页。
- [9] 福素之:《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大思想百科全书》第16卷,《经济学》,东京:春秋社,1929年,第26-27页。
- [10][49][50] 高山三平:《外南洋的资源与我日本人的发展》,南方国策丛书第8辑,东京:南洋经济调查会,1936年,第38、41-42、46-47页。
- [11] 林寿夫:《关于南洋群岛的现状》,南方国策丛书第2辑,东京:南洋经济调查会,1936年,第12-13页。
- [12][13][16][19][38][39][41][42][43] 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作为国策的南洋移民问题》,台北: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1929年,第8、1、5、3、4-5、7、11页。
- [14] 日本外事协会编:《从当地看南方政策》,东京:日本外事协会,1936年,第213页。
- [15] 楠井隆三:《从据点性到基地性》,台湾总督府:《台湾时报》(南进基地论特集),1941年11月号,第18-19页。
- [17] 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菲律宾比律达沃州的日本人产业调查报告 附:关于该地旅居日本人保健的意见书》,台北: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1929年,第17页。
- [18][29][30][31][32][34] 台湾总督府殖产局:《南支南洋日本人企业的资助》,台北:台湾总督府殖产局商工课,1935年,第38、122、120、120、32、19页。
- [20] 中村孝志编:《日本的南方干预与台湾》,天理:天理教道友社,1988年,第19页。
- [21] 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南洋的日本人的事业》,台北: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1926年。
- [22] 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沙捞越王国日本人企业一览》,台北: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1928年。
- [23] 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南洋各地邦人栽培企业要览》,台北: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1929年。
- [24] 台湾总督官房外事课:《南洋各地邦人栽培企业要览:附 南洋邦人林 矿 水产业要览》,台北:台湾总督官房外事课。

事课,1935年。

- [25] 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英属北婆罗洲、达沃地区的椰子栽培业 附:企业参考资料》,台北: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1927年。
- [26] 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荷属印度摩鹿加群岛近海的鲑鱼业及该地方冲绳县渔民的状况》,台北: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1928年。
- [27] 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马来半岛与苏门答腊的栽培企业比较》,台北: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1929年。
- [28] 台湾总督府外事部:《关于台湾的南方合作》,台北:台湾总督府外事部,1943年,第44页。
- [33] 清水元:《战前新加坡、马来亚的日本人经济参与形态》,《亚洲经济》,1985年第3号,第26-27页。
- [35] 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编:《南支那及南洋调查书目录》,台北: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1935年,第47页概说部分。
- [36] 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南洋各地物产 交通 人口地图》,台北: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1929年。
- [37] 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编:《南洋的养蚕业》,台北: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1929年。
- [40] 后藤乾一:《近代日本与东南亚》,东京:岩波书店,1979年,第88-89页。
- [44] 日本商工省贸易局贸易课:《南洋日本人的橡胶投资事业》,东京:日本商工省贸易局贸易课,1928年。
- [45] 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南洋各地邦人栽培企业要览》,台北: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1926年。
- [46][53] 日本拓务省:《拓务要览 1931年》,东京:日本拓务大臣官房文书课,1932年,第589、627页。
- [47] 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南洋各地邦人栽培企业要览》(修订版),台北: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1930年。
- [48] 台湾总督官房外事课:《南洋各地邦人栽培企业要览:附 南洋邦人林 矿 水产业要览》,台北:台湾总督官房外事课,1935年。
- [51][54] 匝瑳胤次:《从海洋国策看南洋的重要性》,南方国策丛书第7辑,东京:南洋经济调查会,1936年,第32、32页。
- [52] 峰整造:《综合的国防力与南方经营的紧急任务》,南方国策丛书第3辑,东京:南洋经济调查会,1936年,第73页。
- [55] 日本拓务省:《拓务要览 1933年》,东京:日本拓务大臣官房文书课,1934年,第686-687页。
- [56] 桑原东宁(台拓调查课课长):《南方移民私议》,台湾总督府:《台湾时报》,1940年12月号,第19-20页。

[责任编辑:邵 鸣]

Investigations on Overseas Japanese in Southeast Asia by the Governor-General Office of Taiwan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Centered on the Investigation Division of the Governor's Cabinet

CHEN Yan-yun

(Th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Guangdong)

Abstract: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vestigation Division of the Governor's Cabinet in 1918 to the mid 1930s, in order to coordinate with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on its implementation of "Economic Southward Expansion" strategy towards Southeast Asia, financially support Japan-invested enterprises in Southeast Asia, and help Japanese economic forces penetrate into Southeast Asia, the Governor-General Office of Taiwan, centered on the Investigation Division of the Governor's Cabinet,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on overseas Japanese in Southeast Asia. Heavily based on the archives, official documents and publications collected by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the Governor-General Office of Taiwan, this article tries to discuss the motivation, manners, contents of the investigation on overseas Japanese in Southeast Asia, and illustrate it's role in the process of Japanese "Southward Expansion".

Key words: the Governor-General Office of Taiwan, Investigation, overseas Japanese in Southeast Asia, Southward Expansion